

对“过头税”应该露头就查

“当财政局的一位领导来收‘过头税’时，对我说‘兄弟帮忙’，你说，我能怎么办？”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实际上，孟平所经营的纺织服装信息商务中心营业收入一年大约为6000多万元，目前公司银行贷款利息每年就有5000多万元，经营还处于亏损状态，但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为了完成税收任务，不仅要求该企业将今年的960万元定额营业税全部缴纳，连明年的960万元也全部“预支”了。

孟平的企业一年下来，营业收入除了还贷利息、上缴当年的营业税，本就所剩无几，预缴了明年的营业税，这家企业还能支撑到明年吗？令人揪心。

令人担忧的显然不止孟平一家企业，此前媒体也有类似报道。“过头税”已经事关企业存亡和就业，有关部门对此不能袖手旁观。

今年以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等三令五申不收“过头税”，很多地方“过头税”却照收不误，有的甚至透支未来的税收，有的加大征税幅度等。公众看着各种“过头税”的新闻，地方财政、税务违规征税手段花样翻新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今年，本是结构性减税、让企业轻装上阵的一年，但如果“过头税”之类的现象加剧，将使很多企业难有税收负担减轻的感觉。7月，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的调研报告指出，上半年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.43%出现减产停产，但前5个月这些企业在利润下降19%的情况下，应缴税金总额仍增长了1.9%。

在刚性的财政增收目标之下，值得重视的，不只是“过头税”的问题。22日披露完毕的各省前三季度财政数据显示，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“失速”的情况下“非税收入”大增，有的地方非税收入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。

靠征收“过头税”、罚款支撑今年的财政收入，无疑是杀鸡取卵。这个道理很浅显，可是，如何遏制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、滥罚款，却又相当困难。征过头税的是地方政府，滥罚款的是地方政府，地方政府从中获益，或许一些地方政府并无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。至今，似乎很少听说过，哪个地方对“过头税”零容忍，将征收的过头税退还给了企业，处理了相关人员。

然而，眼看着年底临近，很多地方的财政预算收入目标要完成，支出压力在增加，不排除更多地方会加大“过头税”的征收力度。这不但利于中国经济的“回暖”，反而有可能雪上加霜。

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改变观念，提高对财政增收减缓、甚至负增长的容忍度，通过压缩“三公”等不必要的开支，渡过难关；另一方面，也需要加大对违规征税、罚款的清查和惩罚力度。不妨，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举报的作用，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针对“过头税”、“滥罚款”的清理。对那些已经征收的“过头税”，依法查处，严惩不贷。京文

面对“过头税”企业能不能说不？

今年以来，浙江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，一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。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，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，其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，比如今年增收增幅不够，为了数字上好看，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收过来“预支”。(10月23日《潇湘晨报》)

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，曾一路高歌猛进的财政收入也转入低速增长轨道。地方政府“钱袋子”开始变紧，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频频表态坚决不收“过头税”。但显而易见，这样的表态与要求，并没有完全遏制现实中“过头税”。实际上，类似的“过头税”现象，不能简单地用“乱收费”或“重复征税”来概括。

众所周知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，依法纳税，是其应尽的义务，但同时也必须明确，这也是其应有的权利。如果企业要承受税务机关为完成任务所进行的“寅吃卯粮”的过头税，势必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，仅仅是缴税已难力不从心，创新、科研投入、人员培训等，不可避免受到影响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种竭泽而渔、极其短视的行为。而这样的行为，发生在本应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税务部门身上，更显得不当。

其实，“过头税”一路高歌猛进的现实映衬出的，除了税收权力的强势之外，还有企业的权利弱势。换句话说，对于这种严重违法背收法规的征税行为，企业完全可以拒绝甚至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，但现实却是另一种尴尬与无奈。按照社会学界孙立平的观点，企业的权利贫困，是“非制度化生存”的缩影和写照。

所谓“非制度化生存”，就是指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环境缺少确定性，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时，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，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。比如，在经济放缓时，不是依据现实情况出发，而是一味为了税收增幅，置正常的税收法规和制度于不顾，“寅吃卯粮”、“过头税”等不按规则出牌的权力行为层出不穷就源于此。

在这样的“非制度化生存”困境里，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在权利贫困和脆弱的情况下，企业寻求对自身权益的保护，可能会与公权力建立庇护关系，这也正是“过头税”在很多地方潜滋暗长，却并没有遭遇企业揭露或抗议，而是媒体调研时才发现的苍凉注解。

须知，“鹅城”式的税收，不仅会增加企业负担，同样也是在为权力寻租和腐败交易创造土壤与动力。杜绝“过头税”之类的乱收钱，根本还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，给企业以权利充足、生态健康的生存环境。否则，今天会有“过头税”，明天依然会有其他的额外负担与压力。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。邓为

什么样的人生最幸福

拥有幸福人生，几乎是每个人的追求。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最幸福？怎样才能获得幸福人生？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，回答可能有千差万别。是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？是官高爵显、大权在握？还是像红烛那样点燃自己，照亮别人、奉献社会？

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明确回答。郭明义，既没有丰厚的财富，也没有什么权力。但他拥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幸福：53本献血证、140张汇款单、200封感谢信……这就是他拥有的幸福人生。面对别人的不理解，郭明义说：“有人觉得存款多、房子大是财富。可我觉得物质财富，只供个人享受，不算真正的幸福；如果用来帮助困难群众，大家分享，就会带给更多人幸福。”

被誉为“大山之子”、“牧民们的贴心人”的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，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各族群众的深厚情感，在偏远的大山里工

作了20年，用自己的行动唱出了一曲各民族团结发展的时代之歌。师延林说：“和家人在一起是幸福，但为老百姓办了好事、有了工作成绩也是一种幸福，为老百姓办的好事越多，被他们信赖，幸福感就越强。”

前不久，权威机构曾对105位基层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进行问卷调查，探求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幸福观。问卷调查中，79%的受访者认为，“敬业奉献，得到群众好口碑”是最幸福的事。

幸福观与人生观、价值观紧密相连，有什么样的幸福观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、价值取舍、行为准则。心系群众、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，正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应当树立的幸福观。

奋斗为了什么？对于一个先进政党而言，答案只有一个，这就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奋斗，努力为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“打天下，坐江山，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辣酸甜；谋幸

福，送温暖，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……”为人民谋幸福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崇高追求。人民对幸福的追求没有穷尽，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永无止境。

“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……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，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。”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共产党人应当进一步把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贯彻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之中，使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各项工作更加体现时代特征、符合现实要求；应当切实增强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牢固树立和自觉实践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的理念；应当把实现人民群众幸福作为永恒追求，真诚倾听群众呼声，真实反映群众愿望，真情关心群众疾苦，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真正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变成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。袁新文

仅此一天

重阳前后，合肥市老年公寓献爱心活动突然井喷，这家养老院有位老人甚至一天被志愿者们洗了7次脚。

矛奶奶住在这家老年公寓，一周前，原本较为安静的老年公寓，一下子变得异常热闹，每天都有爱心人士来关爱他们这些老人。10月23日早上7点半吃早饭，老年公寓便迎来了第一批社会爱心人士，这些人主要是来帮老人们打扫卫生、洗头洗脚、剪指甲甚至掏耳朵，并为老人发放零食。

矛奶奶很开心，带着爱心人士给的零食回到房间，还没坐多长时间，第二批爱心人士又来了，依然是同样的工作……

老年公寓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，爱心活动太集中了，要是能够匀一下，平时也有爱心活动就好了。

焦海洋/图



硕士争考环卫工让人五味杂陈

日前，哈尔滨市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环卫系统员工报名工作顺利结束。457个招聘岗位引来11539个报名者，在最终报名缴费成功的7186人中，29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报名者引人注目。

数百环卫工作岗位吸引上万社会人员报考，其“卖点”并非“环卫工”岗位，而是“事业单位编制”。趋之若鹜的报考现象，凸显当今社会职业的层级制依然泾渭分明，还是“体制内的饭好吃”。人们无非基于这样的心理去

报考：如果报考公务员不能，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事业编制职位；假如轻闲而又待遇较好的事业单位挤不进，就加入最苦最累的工作单位，就算累点，有编制待遇差不到哪里去，何况一旦进入体制内，就有了流动机会。

体制内的饭好吃，恰恰折射出体制外除大型国企以外的其他行业，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还不能同日而语，这也说明尽快出台并落实收入分配改革制度有多么必要与重要。否则，如果大家都想着拿“金饭碗”、“铁饭碗”，过安逸日

子，社会创新就无从谈起，社会发展进步缺乏青春激情与根本动力。

笔者不是说硕士一定不能干环卫工作，如果硕士真是热爱环卫工作，报考这一职位也无非厚非。问题是，29位硕士中有谁是由于热爱而报名呢？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，希望为政者能从29位硕士报考环卫工的现象中发现社会问题，并致力于解决问题，从各个方面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逐步实现。涂启智

官员的负罪感从哪里来

陕西省安全监管局日前召开开干大会。新任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赵超才在讲话时强调，要切实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。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时应该内疚，应该有负罪感，应该承担责任。

陕西省安监局前任局长杨德才、“杨表哥”已经落马，新任局长的一举一动自然成了公众关注的目标。他的前任正是由于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时的表现，也就是那个被抓拍定格的瞬间，才使得公众不依不饶，这样的教训赵局长当然应汲取并反思。

不过笔者以为，赵局长提出的“应有负罪感”固然没错，但官员的负罪感并不会凭空而来，也不是某个官员说几句漂亮话就可以做到的。

为官从政也是一种良心职业，一个官员，在面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责任事故时，第一反应应当是“愧疚不安”。这无须等待事件原因得到调查，因为“愧疚不安”不是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追究，而是政治伦理和人之为人的道德要求。

在国外，一个官员辖内发生的任何重大事故，不管与其有没有直接原因，这个官员很可能的选择就是“引

咎辞职”，而这种“引咎辞职”是一种“引咎辞职”。他辞职，不是因为自己负有平常所言的“不可推卸的责任”，而是因为他心灵上有负罪感，对不起民众，他需要自求离任，这与他不是一个好官员、事故是不是偶然发生都没有关系。而这种因负罪感而辞职的行为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品行，更是一种为官的职业道德。

官员由民众委托服务民众，就要对民众负责；有了过失而负有负罪感，或者对于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承担责任，不是什么“高姿态”，而是责任所系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袁浩

城市“挤出效应”让“惶恐族”频生

“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？”一项调查显示，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，而成都、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左右上浮。这个结果引发网上网下的热议，不少人甚至已觉得自己沦为“惶恐族”，因为达不到这个收入数字的大有人在。

“惶恐”是对生活的一种焦虑，相对微薄的收入让他们们的生活多了一份不安心。或还房贷，或交房租，或交水电费，或购车，或孝敬父母，或人情往来，一个月算下来，一旦捉襟见肘，日子想要舒心，想要

幸福感，只怕也难。实事实是地讲，过日子难免有人入不敷出，或过得很拮据，因而对日子“惶恐”的人，总是有的。然而，当一个城市里“惶恐族”占驻了相当部分时，却也折射出这个城市的无情，表明城市只求“挤出效应”，而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大有人在。

现在的大城市，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，其发展的价值取向，乃是通过经济杠杆，提高生活成本，发挥“挤出效应”，也就是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挤出城市，实现城市人口的均衡合理，避免人口爆炸。然而，

当这种讲求太过，却既不符合“让城市生活更美好”的人居理念，也会产生诸多现实问题。

放眼世界，一流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只有高收入阶层。倘若没有，那么这种城市人口结构的失衡，最终必然会导致城市部分功能的丧失，以致与一流城市无缘。城市越发展，越应当适合不同收入群体的生存。也就是说，不同收入群体，都应当也能够在大城市里找到生存的空间，才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。这里的关键是，其收入，应当与其劳动价值与生活成本相匹配，而不能是一流的

如何借“国考热”遴选公务员？

在国考报名人数经历了2010年度约144万人，2011年度约141万人，2012年度约130万人的三连降之后，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有望逆转并创下新高，达到破纪录的150多万人，“国考热”再次升温。(10月24日 京华时报)

如何解读“国考热”？有人说，千军万马走“官”道，反映出“官场”之吸引力——据说那里有权力、有地位、有“油水”，收益大风险小。诚然，有些报考者确是奔着“金饭碗”去的。但客观讲，在经济增长趋缓、学历“通货膨胀”、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，也有很多报考者(如多数大学毕业生)是抱着“多参与一次考试，多一份就业希望”的心态挤上这座“独木桥”的，不宜过度解读为“全民皆欲当官”。

笔者认为，在就业市场上，政府占据了绝对买方市场地位，拥有对数以百万计的劳务提供者的选择权。面对政府这个最大的就业岗位提供者，百万人争相奔赴也属正常行为。说到底，“国考”也只是就业渠道之一。

关键在于，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要正确引导、运用，借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，遴选出一批品德高尚、学识扎实、有志于投身社会管理、服务人民群众的“德才兼备”“品学兼优”的公务员，使“国考”成为提高公务员队伍道德水平、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、密切干群联系和改善政府形象的重大契机。

其一，要提高公务员队伍“换血”力度，逐步加大年度公务员招录数量，以新鲜血液促进政府管理队伍队伍新陈代谢。其间，既要下决心加大对个人品行差、服务意识差、管理能力差的“三差”公务员的监督惩处力度，明确并落实公务员退出机制，还应建立起公平通畅、以官德和才能为考察核心的公务员晋升机制，加速公务员队伍整体水平提升。

其二，要确保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平性与科学性，让最具官德、最有能力的人从事政府社会管理。重视规则平等与透明化运作，杜绝“定向招聘”“萝卜招聘”，慎用“性格不合”“特殊情形”等抽象概念。此外，还需完善公务员遴选方式方法，改进“一考定水平、一而定取舍”的粗放式考核机制，挑选出既愿为人民服务、又能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，进入“人民公仆”的行列。方问禹

“仅限本科”不如“不限本科”

2013年度国考12901个职位共招录20839人，经查阅统计，其中学历要求为“仅限本科”的职位有3379个，将近所有职位的三成。对此，不少研究生表示，研究生三年白读了。(10月24日《广州日报》)

与研究生感慨不公平不同，相关方面倒是一片叫好。用人单位称，基层太苦，留不住人，不如用本科生实在；专家表示，这是因岗选人，防止人才浪费。这么说来，三成都嫌少了，应该推出更多的岗位“仅限本科”。

并不否认，学历不等于能力，同样的岗位，研究生未必比本科生干得更好。特别是在当前研究生一再扩招、质量受到怀疑的今天，很多岗位，本科生完全可以干得很好。但必须看到，这里是“未必”，不是说，研究生肯定没有本科生干得好。同样，虽然现实中存在一些岗位留不住研究生现象，但是，这些岗位就一定留得住本科生吗？这里还有一个“未必”，未必所有的基层岗位，都留不住研究生，都留得住本科生。

客观、全面，是看待问题、分析现象，所必须具备的眼光。只看到“未必”，是一片片面、狭隘眼光。就整体而言，有什么数据证明，研究生的能力不及本科生？凭什么说本科生能够胜任的岗位，研究生不能胜任？

至于浪费一说更是可笑。在就业压力无比巨大的今天，跟研究生谈报考公务员人才浪费，简直是站着不嫌腿疼。年轻人拼命考公务员，只为追求稳定的金饭碗，确实让人焦虑。可这种急功近利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？一项调查称，超七成人认同有钱不如有权。在公务员含金量持续增加，就业难持续加剧的现实下，劝研究生不要去考公务员，这难道不很矫情吗？按照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的说法，现在公务员中服务性的岗位大幅度增加，岗位工作基本都是类似流水线的日常工作。服务性岗位、业务性岗位由本科生担任即可，研究生更适合去侧重技术和研究的岗位。这么说有道理，可现在的问题是，研究生到哪里去找适合的工作？谁又能保证那些工作更有前途？

而且，所有粉饰“仅限本科”的溢美之词，一碰到大专生就会原形毕露。按照学历越低越适应基层的观点，那大专生岂不是比本科生更适应基层？研究生从事服务性岗位、业务性岗位是浪费人才，本科生何尝不是浪费人才？这些岗位，大专生同样能够做得很好。据称，国家干部队伍中大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已达到75%以上，已经没有进一步提高知识含量的必要。这一意义上，更应该做的是“不限本科”，让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具有同样的报名资格，最终择优录取。

公平是国考的第一考量，公平不仅在考试过程，也体现在资格设置。只要满足岗位基本需求，就应该敞开大门，给更多人一个报考机会。通过“仅限本科”来拒绝一个群体，歧视一个群体，这是最大的不公平。或许，今天研究生招生过火了，而且质量也不敢恭维；研究生报考公务员过火了，流露出了不正常的就业观，但必须想到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哪里？更应该想想，研究生的出路在哪里？乔杉

生活成本、二流的劳动、三流的收入，如果出现这种错位，“惶恐族”就会呈现增多之势。

城市的“挤出效应”，会触发一些群体的“自觉逃离”，这是必然而正常的反应。但是，当上述错位过大，劳动所得很难与劳动价值和收入相匹配时，相当群体的逃离，会损伤城市的品质。说白了，就是城市需要一类人干活，却只支付低工资，让其承担高生活成本，其结果必然导致这类活没人干。而留下的两类群体，一个就是不得不精打细算的“惶恐族”，一个则是都市贫民窟群体。

“惶恐族”往往游离在留下或逃离的边缘，他们处于生活的焦虑之中，生活品质下降，幸福指数不高。他们要想在城市里把日子过下去，就得想法儿挣钱。

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人，有获得在城市惬意生存的权利。现代化的都市，应当着眼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，从制度上减少“惶恐族”现象。从根本上说，唯有提高收入，使其与付出的劳动价值相匹配，最终才能达到与生活成本相适应的良性状态。如是，过日子“惶恐”者或有，但不会成群成患。李明儒